

主编 谭晶华 李征 魏大海

日本文学研究·多元视点与理论深化

日本文学研究会延边大学十二届年会论文集

- 作为隐逸文化人的岛村
- 三岛由纪夫论
- 季语的美学
- 之于村上春树的物语
- 浅析菅原道真《闻蝉》《新蝉》的寓意性
- 近代日本的海洋想象
- 日本“海洋文学”的一个样式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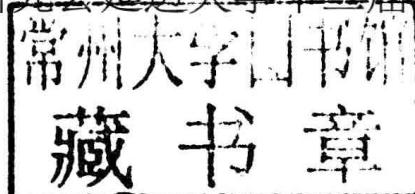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主编：谭晶华 李 征 魏大海



日本文学研究：多元视点与理论深化

日本文学研究会延边大学十二届年会论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学研究会延边大学论文集/谭晶华, 李征, 魏大海主编.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436 - 8630 - 4

I. ①日… II. ①谭… ②李… ③魏… III. ①文学研究

—日本—文集 IV. ①I313. 0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6490 号

书 名 日本文学研究:多元视点与理论深化——日本文学研究会延边大学十二届年会论文集

主 编 谭晶华 李 征 魏大海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csjy@163.com(日本方向选题投稿信箱)

特约编辑 霍芳芳

封面设计 祝玉华

出版日期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700mm×1000mm)

印 张 22.75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6 - 8630 - 4

定 价 49.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 - 653 - 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建议陈列类别: 日本文学研究

编选者言

2010年8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本会第一部论文集《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开篇是现任会长谭晶华教授的30年综述“回眸与见证(代前言)”。这部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的编辑、出版,旨在回顾中国日本文学研究30余年以来的基本历程,展现当今国内的日本文学研究现状,推进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的持续、深入发展。文集50万字上下,具有里程碑式的承前启后作用。许多文章包括若干纪念性随笔,具有史料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文革”结束后30余年来,1979年成立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或推动作用。创立本会的元老之一吕元明教授(现为名誉会长)在日本文学研究会30周年纪念文集上刊文,将参与学会创建的同仁称做日本文学研究会的“种子”和“功劳者”。而今,创建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前辈学者多已辞世,健在者亦已年届耄耋。在当今国内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才俊辈出的时代,不应忘记那些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创立者和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奠基、铺垫和诸多贡献的前辈学者。

由近年的年会和学术交流活动可以看出,大批中青年学者业已成为本会的新生力量或会员主体。为了使新加入者了解学会的相关历史,有必要在新的文集编辑刊出时,重复绍介本会的基本历史。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曾为国家民政部认定的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会员三百余人。现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属下的国家级二级学术团体。首任会长是林林,名誉会长是夏衍、楼适夷;次任会长是李芒;三任会长是高慧勤;现任会长是谭晶华。吕元明、金中、李德纯等长期担任副会长。日本文学研究会前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第二届在

济南市山东大学(1982);第三届在河南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1985);第四届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1988);第五届在福建厦门大学(1991);第六届在山东烟台大学(1994);第七届在上海外国语大学(2000,改为两年举办一次);第八届在山东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2);第九届在西安外国语学院(2004);第十届在成都四川大学(2006);第十一届在大连外国语学院(2008);第十二届在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2010)。每届年会,都确定一个学术研讨的主题——如“二十世纪日本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古典文学中的审美传统”、“多元文化交流中的日本文学研究”、“国际性、学术性:学术互动中的日本文学研究”、“都市·传说·历史:学术互动中的日本文学研究”等。为了拓宽会员的学问视野,提升相关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水准,历届年会先后邀请了中西进、川本皓司、平冈敏夫、铃木贞美、原善盛宁、严绍璗、王晓平、李哲权、刘建辉、王敏等国内外知名学者与会做大会讲演。大会发言后,依惯例分“古典文学组”、“近现代文学组”、“当代文学组”、“文学翻译组”、“比较文学组”等,进行小组会学术发言并讨论。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挂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首要功能或职责在于团结全国的日本文学学者,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包括学术讲演活动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以达到交流信息、促进学术发展的目的。日本文学研究会不定期举行了各类重要的学术讲演会或国际学术研讨会,如与日本大众文学研究会(前会长是曾任日本笔会会长的尾崎秀树)举办了两届学术研讨会,探究了大众文学的背景、定义、特定作用及与纯文学的关系等;与日本川端文学研究会(前任会长是长谷川泉、次任会长是羽鸟彻哉)举行过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细致的探究与讨论,推动了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化与发展;还与日本解释学会(前任会长羽鸟彻哉)联合举办了多次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8月在西安陕西师大文学院共同举办了首次中日韩三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纪念文集中,名誉会长吕元明的纪念文章是《日本文学研究会建立时日的回想》。文中涉及的诸多问题或历史景象已鲜为人知。诸多描述,看似琐碎逸事,却对后学把握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特定时期的历史状况、研究者的特殊性格乃至特定研究的历史位相,有着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文章结尾,吕先生充满怀念地说:“日本文学研究会建会以来30年,先后逝世的(就我所知)有李芒、黄源、雷石榆、叶水夫、高慧勤、季羨林、刘振瀛、李正伦、黄瀛、吴元坎、平献民、仰文渊、柯森耀、卞铁坚、金中、王长新、莽永彬、赵乐甡、宋世宜……谨为他们祈祷!”纪念文

集中其他回忆性散文有黄瀛先生的遗作《宫泽贤治随想》，勾勒了作者早年与日本作家的一段交往。其他文章有文洁若的《纪念李芒与高慧勤两先生》、陈喜儒的《我与日本文学》、李长声的《中国几近出版两套日本文学大系》、吴念圣的《从我家的唐三彩马说起》和刘春英的《〈日本文学〉杂志创刊始末》等。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勾勒、回顾了日本文学研究会特定时期的历史足迹。

纪念文集中的论文选录，前辈学者有李芒的《美的创造：论日本唯美主义文学艺术》、高慧勤的《川端康成：“感觉即表现”》、李德纯的《〈伊豆舞女〉论》、文洁若的《鲁迅与大江健三郎》、陈生保的《正冈子规与中国文学》、罗兴典的《翻译理论与诗美的创造》、陈应年的《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中国译介》等。中青年学者的优秀论作，古典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有吕莉的《“白雪”入歌源流考》、张龙妹的《〈源氏物语〉中“嫉妒”的文学文化史内涵》、张哲俊的《日本嵯峨天皇〈折杨柳〉的训读与考辨》、马骏的《〈怀风藻〉诗歌语言的基础性研究——诗想·诗句·诗语出源考》、刘小俊的《论中国文学对日本古典诗歌的影响——从夏蝉和秋蝉说起》等；近现代或比较文学方面，有李征的《日本近代文学与都市空间表象——横光利一〈上海〉中“地名抹消”的意味》、刘建辉的《作为东方主义的“支那”趣味——谷崎文学中的另一种世纪末意识》、周阅的《川端康成文学的隐喻性与〈庄子〉——以〈禽兽〉为中心》、王成的《1935年秋：北平幻想曲——林语堂与阿部知二的〈北京〉》等。作家、作品论中别具特色的有李哲权的《夏目漱石新论——作为隐喻的植物》、邱雅芬的《论中国旅行前的芥川龙之介汉诗》、林少华《作为斗士的村上春树——村上文学中被东亚忽视的东亚视角》等。许多论作，显现出特殊的学术视野或把握对象的敏感性。

前述论作，体现了当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和水准。值得一提的是，本会海外会员的研究别具特色。如李哲权的《夏目漱石新论——作为隐喻的植物》，为那些避实就虚、不求甚解的研究设置了极端的反证。刘建辉的代表性论著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30周年纪念文集选录了刘建辉一篇论文《作为东方主义的“支那”趣味——谷崎文学中的另一种世纪末意识》，涉及最早描述中国的近代日本作家、日本近代旅游机制的成立与另一种“世纪末”——中国“奇谭”的创作等。其理论视角与论述方式同样具有特殊的前沿性。

关于本辑论文集入选论文的基本特征，不做重复绍介。请读者自己阅读和判断。总之，从当前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上看，比较文化或比较文学的研究乃为主流，实证性地考察文学与地域、历史或文化的关系，成为中国日本文

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研究方法之一。超越旧式的纯文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诸般关联中实现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成为目前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和必然。当然,谁都无法割断历史性的学术关联,当今的学术景象与 20 世纪以来各个时期的日本文学传播与研究,尤其与“文革”后、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以来的日本文学翻译、传播与研究,具有紧密而必然的历史性关联。令人欣慰的是,历经 30 年磨炼的中国日本文学传播与研究事业,正在趋向规范化、多样化和国际化。论者必定具有这样那样相对的局限性。某种意义上,以全国性学会的历史脉络为线索,连续编辑、出版本会的学术论文集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相对意义上的代表性。2010 年,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延边大学成功举办。会前会后,开始筹备编辑、出版学会的第二辑学术论文集。此次论文集的基本构成,因篇幅所限,仍无法全部纳入国内相关学者优秀的研究成果,只能竭尽所能地使文集中选入的文章,具有相对的涵括性或代表性。敬请广大会员鉴谅。第二辑学术论文集的编选过程中,承蒙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支持,选编工作是顺利、成功的。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文集选编中的不足和缺憾,亦请广大会员提出宝贵意见。本会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逐步改善,持续编辑、出版本会的学术论文集,希望对国内相关研究的积极发展有所推动。

魏大海

2012 年 4 月 29 日

目 录

编选者言	[1]
作为隐逸文化人的岛村	
——论《雪国》的岛村形象	谭晶华 [1]
身体的表现与小说的政治学	
——横光利一《上海》中的外国人表象	李 征 [8]
战争·记忆·想象力	
——以文禄之役(壬辰倭乱)为中心(魏大海译)	崔 官 [25]
漱石·莱布尼茨·笛卡尔	
——哲学的文学与文学的哲学(李征译)	李哲权 [46]
现代主义作家宫泽贤治刍议(张秀阁、魏大海译)	
——铃木贞美 [65]	
侮蔑、趣味、憧憬、威胁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表象(魏大海译)	刘建辉 [78]
日本文化与“私小说”·序论	
——随笔与小品(王燕、靳卫卫译)	胜又浩 [94]
以“变身”为主题的物语《竹青》	
——以时代背景为中心	横路启子 [102]
三岛由纪夫论	
——李德纯 [111]	
季语的美学	
——秋冬篇	郑民钦 [129]

之于村上春树的物语

- 从《地下世界》到《1Q84》 林少华[140]
- ### 作为教化与娱乐的大众文化
- 溯源日本20世纪上半期的文化研究 王志松[151]
- ### 川端康成的父系家族意识与儒家伦理观念 周 阅[164]
- ### 上野凌嶠和伪满洲国的国策文学
- 从理论到实践 单援朝[176]
- ### 启蒙文艺观与“现代性”言说
- 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浅论 李 强[187]
- ### 通篇怨恨加点超人的痛快
- 解读《保元物语》 吴念圣[200]
- ### 本居宣长的“物哀”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局限性 张龙妹[213]
- ### 《怀风藻》诗歌人名对“和习”表达价值探佚 马 骏[224]
- ### 浅析菅原道真《闻蝉》、《新蝉》的寓意性 刘小俊[236]
- ### 《源氏物语》的“唐物”、唐文化与唐意识 丁 莉[247]
- ### 试论蕉门俳谐的探“诚”之道 权 宇[258]
- ### 中国文化的延伸与扩展
- 论夏目漱石笔下的“白云乡”与“色相世界” 祝振媛[267]
- ### 日本近世后期町人眼中的儒家文化
- 从式亭三马的滑稽本谈起 勾艳军[275]
- ### 审视十九世纪歌舞伎中的“白浪物” 陈晓琴[284]
- ### 近代日本的海洋想象
-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前后日本文学中海洋形象的变迁 庄 焰[293]
- ### 大江健三郎文学中“动物”的多重隐喻
- 从《奇妙的工作》到《别了,我的书!》 霍士富[305]
- ### 日本“海洋文学”的一个样式
- 以井伏鱒二的《中浜万次郎漂流记》为中心 魏大海[323]
- ### 悲凉世界 彗星一茶 秦 岚[346]

作为隐逸文化人的岛村

——论《雪国》的岛村形象

谭晶华

川端康成是日本现代文学家中比较难于理解的作家之一,川端文学中的空白、委婉、含蓄的表达十分显眼,文章的含意丰富,非现实的象征性与日常的现实性交叉,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世界。这种扎根在日本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中的创作使不少作家相信:外国人难以理解川端文学。川端康成本人也说过:“我认为那部小说西方人无法理解,《雪国》是反西方小说常识的……”的确,对于《雪国》的创作,除了艺术表现之外,对其主题及人物形象的研究,在中国也是见仁见智,大不相同的。

在人物形象的研究方面,迄今为止,对驹子的研究最多,而对岛村的研究往往被忽视。日本不少文艺评论家认为,川端康成笔下的人物形象女性远胜于男性,女性一个个写得栩栩如生,而男性则很少有公认写得成功的。川端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文学是“懒人的文学”,理由是“我很少写男性,要写男性,总得有个职业,就必须去调查职业,那太麻烦。所以以女性为主,就不成了最典型的懒汉嘛。”(见日本广播协会编《文坛闲话》,青蛙房出版)接着他又说“社会啦,思想啦,我也很少涉及。”在《雪国》中,尽管川端倾其心血写活了驹子,但是,从作品的结构看,岛村形象所占的比重颇大,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雪国》中所有上场人物均与他有关,从作品的开头到最终,他都在结构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品中川端康成多次用了“夜底”、“镜底”之类的词,而岛村的“底”倒也很值得研究。

岛村给读者的印象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生长在东京工商业者聚居区,是个有家室的中年男子,拥有父母留下的财产,过着奢侈的生活。他没有说得上名的职

业,却又是对西方舞蹈艺术很有兴趣的知识分子,他所介绍的西方舞蹈的文章不时见诸报端,勉强可以算作会舞文弄墨的文士,但写出的东西大都是“纸上谈兵”,这一点,岛村自己也很明白,不时一边自嘲,一边又“安心”于这般的生活状态。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却又并不满足。他自我辩解说,自己在“当今时代”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人物,所以乐得感到安心。然而,岛村在作品中又是一个内省性的、会思考的人物,读者通过他能看到不为他安排职业的作家的独具匠心和创作意图。离开时代的背景将无法分析《雪国》,因此,注重岛村这个人物的社会本质,并以此为重点去分析作品似乎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方法。

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存在,决定于体现人物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往往占有不小的比重,反之又可以说,由于文学作品各种因素之间相互的规定性,这种关系与作用实际上成了反映每个人物本质的屏幕。《雪国》在人物形象描写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注重把人物的个性隐匿于人物关系之中,再通过人物关系去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人物的个性。作品在人物关系的设计、描写方面的真、复杂、含蓄和新巧,使它既成功地塑造了形象,又展示出脱俗、清新的艺术格调。

《雪国》在围绕着女主人公驹子展开描写的同时,又如何表现岛村的作用呢?让我们通过作品来考察一下。有些评论说岛村是“视点人物”,即一种穿针引线的人物。岛村在《雪国》中不仅以第三人称出现,而且作品情节的布展和结构的安排也都是岛村的所见所感、所思所忆,若把作品按第一人称去写似乎也不难。然而,岛村又不仅仅是穿针引线的道具式的人物或摆设,在为作品服务的形式方面,他的作用显而易见。

在《雪国》中,岛村与驹子的关系是作品里所有人物关系中最密切、最重要的部分。他三次跑去雪国与艺伎驹子藕断丝连,令驹子对他一往情深,明知这种关系是暂时的,不可能持久的,却也无限哀怨地为了片刻满足而不思舍弃。这正是作品试图形象表现的令驹子灵魂痛苦的爱情。由于这种说明完全是借助岛村以及他对驹子的关系来实现的,因此,驹子形象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岛村个性化程度。反过来说,岛村形象的塑造,既受到与驹子关系的制约,又在与驹子形象的相互衬映中完成。

《雪国》巧妙地为读者展示出岛村对驹子态度的双重性。

一方面,岛村在肉体上为驹子所吸引,垂涎她的年轻和美貌,花钱占有她的肉体,而这在身份迥异的岛村和驹子双方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对此,作品极其

自然地描述了岛村初次与驹子见面后的感想：

她的声音里透着真情实意，不免使岛村有些内疚，觉得自己是否轻率地骗了她。

但是，他并没有说谎。无论如何她总还不是风尘中人。他即便要找女人，总可以用问心无愧的方法，轻而易举就能办到，何至于来求她。她太洁净了。乍一看到她，岛村就把那种事与她分开。

在这里，原本不打算向驹子求欢的岛村，竟可以由于在其他艺伎身上得不到满足而自食其言，雪国分手后既不写信也不信守诺言却寄舞蹈造型书籍给驹子，之后，在对待驹子不幸的命运和处境的问题上，也始终抱着一种旁观者的态度，维持着不能为她做什么事的界限。驹子对他越痴迷，他越认为那是“徒劳”。最后决意割舍魂牵梦系的三年情感，再也不来雪国。岛村的种种表现，无不说明岛村与驹子两人关系的实质，并未超越花钱买笑的范畴。岛村对两性关系的轻浮、胡来与不负责任，体现出那个社会中嫖客与妓女关系的共性。

需要说明的是，80年代中期，中国不少评论文章把岛村简单地打入嫖客、流氓之列，认为他喜好年轻女性的美貌和肉体、眠花睡柳实在是一种劣迹和堕落，并加以严厉的批判。笔者无意为岛村的行为开脱和粉饰，只是觉得文艺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分析岛村这个人物的时候，应以不脱离当时的实际生活为前提。在日本近现代社会中，一般说来，社会舆论并不会去强烈指责岛村的所作所为，在本世纪30年代，岛村有其随心所欲“游乐”的条件。而作家川端康成似乎终生未有过整治世风的抱负，更没有把批判岛村狎妓作为作品的主旨，即便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赞扬或肯定这种品行。值得注意的是，川端文学艺术构成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完全不在“嫖妓”的层面，《雪国》的创作题材本身可供发掘的内涵似乎要广泛得多。

另一方面，岛村在与驹子的交往过程中，由于驹子的特定情况又使岛村常常有新思考、有所自省，直至一个文化人的良知有所复苏，从而导致他与驹子的关系产生某种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两人关系的保持与发展，为驹子性格完整地形成提供了依据和可能。

早晨七点和半夜三点，在这种异乎寻常的时间里竟一天两次偷空来看他，岛村觉得很不一般。（以下略）

驹子虽然对他表示爱恋，岛村自己却感到空虚，认为那只不过是一场美丽

的春梦而已。也正因为如此，他好像摸到光滑的肌肤一般，反而感受到驹子身上那股求生的活力。他既哀怜驹子，也哀怜自己。（略）

勉强可以充作文人的岛村，对于驹子奉献的感情，毕竟难以木然。初次相见，除了他个人的欲望之外，驹子的钟情他是颇有感触的。不到二十岁的艺伎对于歌舞伎的修养尤其使他吃惊。即使在冲动中，当驹子哀求他不要超越朋友界限时，他也会被“她那真挚的声音打动”，随着对驹子了解的加深，他的思想情感在不断地变化，岛村既对驹子痴迷于自己感到可悲，又从中受到教育。驹子为他弹奏《劝进帐》时，他感到了驹子的价值，因而更加同情她的不幸、尊重她的人格。

蓦地，岛村感到一股凉意，从脸上一直凉到丹田，好像要起鸡皮疙瘩似的。岛村那一种空灵的脑海里，顿时响彻了三弦的琴声。他不是给慑服，而是整个儿给击垮了。他为一种虔诚的感情所打动，为一颗悔恨之心所涤荡。他瘫在那里，感到洽意，任凭驹子拨动的力，将他冲来荡去，载沉载浮。（中略）

驹子的这种生活作为，岛村认为是一种虚无的徒劳，同时也哀怜她作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憧憬。但对驹子自己来说，那正是生存价值的所在，并凛然洋溢在她的琴声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岛村已比较深入地介入到驹子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之中，他与驹子的关系已不完全表现为金钱与肉体的交换关系，而是具备了一定的感情交流。在两人即将最后分手之前，岛村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驹子是个好姑娘。很明显，岛村在与驹子交往的过程中，他的内心交织着欲望与良心、作践与同情、谎言与道德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成为培育驹子个性的沃土，也较有层次和深度地刻画出岛村这个表现上难以把握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嫖客，一个放荡不羁的多情公子哥的本来面目。

当然，这些还不能说明岛村这个人物的全部。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和文化人的形象，岛村身上还深深地烙着挥之不去的日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代特征，读者通过作品可以有所感悟。

“也是因为如今这世道……”岛村嗫嚅道，忽而意识到语意的空间，不由打了个冷噤。（略）

岛村现在正在翻译瓦莱里、阿兰以及法国人关于俄国舞全盛时期的舞蹈论，打算自己出版少量的豪华版。说来，这种书对今天的舞蹈界未必有用，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拿今天的工作嘲弄自己，恐怕要算是一种痴呆的乐趣吧，他那可怜的梦幻世界，也许正是从那里幻化出来的，尤其他无需这么急着出来旅行。

生活对于这位 30 年代的有闲阔少已失去了魅力，岛村厌倦这人生、这世道，变得百无聊赖。他三次去雪国，与驹子幽会缠绵，在这位对自己合理人生执著追求的年轻女性面前，他的消极遁世的人生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岛村的形象是本世纪前期的日本社会中对于社会和人生持消极失望态度的一种知识分子的典型。《雪国》赋予岛村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竭力表现其虚无和颓唐，以有利于驹子形象的塑造。可以说岛村的形象塑造是真实、成功的，没有这一个岛村，也就无所谓那一个艺伎驹子。

在分析岛村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起垂名于日本文学史的众多的作品中的“社会无用者”、“多余的人”的形象。笔者以为岛村其实也是这类所谓“多余的人”中的一员。二叶亭四迷所著的《浮云》中的主人公内海文三因缺少处世之道，不受上司的信赖被免职，进而失去恋人，深陷苦恼之中无法自拔，生动地体现了明治初期知识分子生存的艰辛与烦恼。正宗百鸟的《向何处去》的主人公是一位“不迷主义、不迷美酒、不迷女色、也不迷自己才智”的“清醒的虚无主义者”，他对他人持不信任态度，怀疑人生的意义，嫌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却又无法不处在这种虚无的生活中，真是矛盾重重。他总是在苦苦追求“向何处去”，却老是找不到方向，最终成为一名冷酷的旁观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多余的人”。大政时代的广津和郎所写的《神经病时代》的主人公铃木定吉是个“性格破裂型”的无用者，他感到自卑，无法拒绝别人的无理要求，不敢清算与歇斯底里的妻子的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生活，只是终日哀叹“难道这就是生活？”他无法发泄心中的愤懑，无力改变毫无生气的生活，处在精神的绝望之中。这些人物连同《雪国》中的岛村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日本明治、大正至昭和初期各时代的作家是如何努力追求解答日本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

讨厌社会、因无可奈何而消极遁世的人并不只是岛村。《雪国》的创作时间是本世纪 30 年代，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残酷镇压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进步作家，导致了许多“转向作家”（即放弃原来革命的进步主张）的出现，军方对文艺严加统制，动辄施以“禁止发行”的处罚，使二战时期的日本文坛成为真正的“不毛之地”。与《雪国》创作时间相近，曾被禁止发行的《瀬东绮谭》的作者永

井荷风也是一位对人生态度消极、终生独来独往、脱离社会的名作家，他对当时被社会遗忘的“多余”的文化人特别同情。同时，他还具有以做违背社会常识的事为荣、认为前进的努力皆是徒劳的虚无的世界观。

现在，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岛村这样的消极遁世者呢？诚然，这里主要有人物自身内因的问题，如“性格软弱”、“缺少信念和斗志”等，但是，严峻的社会环境与现实、政治上的镇压和迫害、思想和文化上的统制，没有写作和言论自由所造成的影响亦是不争的事实。

永井荷风曾深受1910年“幸德秋水事件”（即“大逆事件”）的冲击。当时任庆应大学教授和“三田文学”主编的永井荷风去大学上班时常常看到载着囚犯的马车驶向东京日比谷法院，后来，在幸德秋水等十二名进步知识分子被执行死刑后，永井在1919年发表的《焰火》中这样写道：“我在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事件中，还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令人产生不可名状的厌恶心情的。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就不应该对这个思想问题保持沉默。小说家左拉不是曾经因德莱菲斯事件主持正义而亡命国外吗？可是，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都一言不发。不知怎的，我总觉得难以忍受良心上的羞耻。之后，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创作降低到江户时代那种格调，从那时起，我开始提烟袋、集浮士绘、弹三弦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中国文艺界的大家郭沫若先生。他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中写过不少“扬李（白）贬杜（甫）”的令后人见笑的应景文章，然而在他晚年时，一次与挚友披露过自己的心声：过去写过像《女神》之类的作品是自己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而那些文章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景之作，并不由衷。写这类文章时明知会招人耻笑，却无力摆脱，内心肯定是悲哀的。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都有性格软弱的一面。由于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那些说违心话、随波逐流、消极遁世的人恐怕比舍生忘死、勇敢抗争者更多一些。

日本文化史的研究者石田一良说过：“在明治四十年代的日本出现了两种反体制的知识分子——反抗国家的政治人物（社会改造者）和离国家疏远而去的非政治人物（隐逸文化人）。如果借用永井荷风的讥讽口气，则两者都是给国家（治安）和社会（风俗）散布毒害的‘非爱国者’（《欢乐》1942）……在日俄战争以后一般化了的这些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出现，乃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日本的文化——历史的展开与特征》）这一观点对我们客观、全面评价岛村形象是有参考价值的。岛村也是这种“离国家疏远而去”的隐逸文化人，是在精神上流亡的“反体制的知识分子”。消极逃避式的似是而非的反抗虽不如正面勇敢、积极的斗争，却胜于为虎作伥，蝇营狗苟。从这个意义上说，岛村的隐逸、消极是特殊年代和高

压社会中的一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在研究《雪国》中岛村这个人物的时候,应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和国情,对其表现的社会性进行客观的分析,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川端文学的实质。

参考文献

- 【1】《川端康成的“雪国”六十年》(日本至文堂《国文学解释与鉴赏》别册 1998)
- 【2】《文艺读本川端康成》(日本河出书房新书,1977)
- 【3】谭晶华:《漫谈永井荷风文学的思想倾向》(J). 外国问题研究,1989,(4)
- 【4】李明非,尚侠:《以驹子为中心的生活图画》(J). 日本文学年刊,1982

作者简介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教育部日语专业教学指委会主任。主要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文学史及中日比较文学。代表著作有《日本近代文学史》、《川端康成传》等,以及论文六十余篇。

身体的表现与小说的政治学

——横光利一《上海》中的外国人表象

李 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横光利一初到上海时，居留在租界里的外国人总数已达六万人，国籍分属二十多个国家。其中，欧美国家的侨民，以英美法居多。日本侨民则在两万余。^①其余分别来自苏俄、印度、越南等地。上海租界俨然成了列强凭借军事力量实施治外法权管制的特殊都市空间——“国中之国”。横光利一的小说《上海》虽以租界为舞台，但其叙述视角却是日本人，所以，读解《上海》中的外国人表象，日本人的视角就成了作品隐形的滤镜。这里顺便说一句，正由于小说视点带有这种特殊性，居住在上海租界内外的中国人也顺理成章地作为外国人来加以表象了。这是考察《上海》时，不能不特别加以留意的。

从后殖民的视角看，外国人的表象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课题。正如小说《上海》中参木所言：“我的身体就是领土”（《澡堂与银行》九）^②。小说中的外国人表象始终以参木、甲谷等日本人的视角为主，这一视角，总是被如何跻身欧美列强分割在上海租界的权益这一日本近代国策所左右。因此，其中的外国人表象无形中折射了一九二〇年代至一九三〇年代期间日本人的国际认知，这是不言而喻的。对此，从政治角度来评价显然要容易得多。本文则试图运用都市论、身体论、表象论的方法，对小说的深层做多层解析。文学的隐喻往往比政治的宣言来得更为复杂、更为隐蔽。因此，要揭示出小说《上海》背后的涵义，也需要建立在至为细密文本解读基础之上才有可能。

在展开考察之前，这里再次重申，本文所说的外国人表象，是基于小说中的登场人物“日本人”而言，也即日本人是如何看租界中其他国籍的居留者，如欧美人、印度人、白俄，乃至中国人等。异国、异民族的表象，不仅仅是横光利一的上海旅行